

无奈地调头转向西南，又急切地昼夜兼程赶路了。

四

经过几天几夜奔波，他们绕道甘肃平凉，总算找到了驻该地的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他俩掏出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证件，说明了一路回来的情况，得到了自己同志的热情相助。1943年10月14日，终于搭上汽车抵达了古城西安。

西安与延安虽仅一步之遥，但进入边区的路也被胡宗南的部队严密封锁而无法通过，他们无奈只得住下来。

谁知这一住却是遥遥无期，比呆在蒙古还难受心焦，因为家就在前面，却有家难回。国民党兵设的屏障比蒙古天然大山的屏障更令人心寒气愤。他俩企盼着去延安的车子经过，但每次拦下去延安方向的车，都因为没有特别通行证而无奈作罢。

有天，办事处的一位同志悄声告诉李士英：“最近延安那边正在整风，听说查出来许多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尤其是那些从白区投奔来的青年学生。”言者无心，闻者多虑。李士英突然联想到自己的妻子来，心里特别焦急，真想插上翅膀马上飞回延安，打探妻子王芸的情况。

没有汽车，只能等在这里干着急。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半年，直到1944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党驻重庆办事处的一辆车子赴延安途经西安，车子停在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李士英正巧从外面回来，见院子里停着的那辆大卡车，他赶紧向司机打听：“你们有没有特别通行证？”司机点头说：“有啊。”李士英追问：“能带人直接进入延安？”对方干脆地说：“当然可以。我们这张特别通行证带一车人也可以。”

平时天天企盼的东西，突然一下子降临眼前，李士英反而不相信了。

他让那个司机拿出通行证看看，果然，是胡宗南部队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李士英高兴得一下子跳了起来，他情不自禁地拍了司机一下，恳求道：“我们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已经等了半年了，急得我们啊，简直快给憋死了。没想到今天总算盼来了你这个救星，同志，你稍等片刻，我去整理一下，叫上另外一位同志马上就到。”

那时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一听说是从苏联回来的，人们都肃然起敬，所以司机爽快地一口允诺。

李士英回到住处，却不见李天佑，他便急忙去找尤香一，通知她这一好消息。

尤香一，是著名将领谢子长的遗孀。谢子长，1897年出生，陕西安定人，与刘志丹一起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曾任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西北反帝同盟会和红军陕甘游击总队指挥，中央陕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8月，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于次年2月伤势恶化逝世。谢子长牺牲后，尤香一母子俩到处逃难，沿街讨饭。党组织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母子俩，将他们安排在八路军办事处等待汽车进入延安。

尤香一听说有车进延安后，同样兴奋不已，立刻着手准备起来。李天佑也回来了，他们三下五除二地整理完东西，便急匆匆地与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等人握手告别。

汽车在山道上险象环生，走走停停，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于1944年3月28日，终于来到了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延安。当李士英隐隐约约地望到延河边山头的宝塔时，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牛秉坤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名震中西，“喜连成”京剧戏班也广为世人知晓。然而，东北首富牛秉坤创办“喜连成”戏班，培养出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一大批京剧大师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喜连成”的由来

牛秉坤，字子厚，同治五年（1866）出生于吉林。牛家祖籍甘肃，后移居山西。因家庭生活艰窘，无以为生，牛秉坤曾祖父牛金玉又从山西逃荒到吉林。逃荒前，家中人以砸碎家中仅有的一口铁锅，各执碎碴一片，作为日后重逢的凭证，故后人又把牛家称为“砸锅牛”。

牛金玉夫妇辗转来到了吉林省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先在小东门外种地，开菜园子，后又开店经营油盐烟麻。当时，松花江上，舟船往来络绎不绝，使小店生意非常兴隆，越做越大。1881年，牛金玉的孙子牛化麟病故，牛家企业的管理重担就落在了年仅15岁的少年牛秉坤肩上。

具有经营天赋的牛秉坤，继承和发展了家业，使牛家企业经营范围扩展到高级百货，后来又发展到金融业，开当

东北首富牛秉坤助 梅兰芳出道



当年梅兰芳为牛秉坤在北京买的四合院

铺、钱庄。在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大连、营口、锦州、秦皇岛、山海关、唐山、天津、太原、济南等都有牛家的企业。牛家的“升”字号店铺仅在北京就有17家之多，如专门经销绸缎的“恒升源”绸缎庄、以推销东北烟草为主的“恒升昌烟麻店”、以收旧衣物为主的“恒升禧当铺”、经营南北草药的“恒升堂药店”等等。牛秉坤为适应京城经销玉器古董的需要，又在琉璃厂开设一家“恒升润”玉器店，在前门西大街开设“恒升源”钱庄，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个势力浩大的“山西帮”。他又出资在北京阜成门外建起“山西会馆”，专门接待那些来北京经营的山西老乡。到了民国十年（1921），牛家几乎控制了北京的主要金融业、药材、山货和粮食生意。发展到民国十三年（1924），牛秉坤的“恒升源”钱庄几乎成了北京和华北的主要私人银行，当时许多政要和军阀都要依靠牛秉坤筹划军需之资。牛秉坤在北京的势力是一般外地商人所不敢小视的，所以有“北方胡雪岩”之称。

牛秉坤的业余爱好丰富多彩。摄影、园艺、修理钟表，以及占卜、算卦、批八字等无所不好。他还经常吹打弹拉，凡笙管笛箫无不精通。他尤其喜

欢戏曲，特别是对京剧情有独钟。

牛秉坤是个大孝子，由于母亲爱看京剧，1901年，牛秉坤通过京剧艺人叶春善（京剧表演艺术家叶盛兰之父），请到北京“四喜班”戏班来吉林“康乐茶园”演出，为母亲办生日庆祝堂会。在交往和演出过程中，他通过观察和了解，知道叶春善为人诚恳，办事认真，精通京剧行当。牛秉坤很赏识和信赖叶春善，他提出：请叶开办一个京剧科班，由牛家出资，在北京、吉林两地轮流演出，既可解决牛家看戏的问题，也可以为京剧培养一批人才。叶对此很慎重，唯恐辜负了牛秉坤的美意，推托再三，方才应允。

牛秉坤拨出白银四百两作为开班经费。以他的三个儿子的乳名喜贵、连贵、成贵各取一字，将科班定名为“喜连成”科班，又向北京东大寺精忠庙（清朝时对梨园行说公道话的机构）立案。招收了一批学员，并聘请了萧长华、苏雨卿、宋起山、唐宗成等十三位京剧名师分科执教。

由于“喜连成”科班办得红红火火，牛秉坤又为科班增加了投资，并派专人管理财务，使戏班越办越好。后来，牛秉坤同叶春善还结成了连襟。“喜连成”科班从1904年到1944年共招

收了12班，培养了京剧学员700余人。很多学员日后在京剧界都成了“名角”，声誉极隆，比如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

牛秉坤慧眼识珠

如果说梅兰芳是世界艺术苍穹中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那么，造就这颗明星的诸多因素中，不得不提牛秉坤。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国丧”期间在北京不能唱戏。叶春善便带着“喜连成”戏班远下关东，来到松花江畔的小城吉林唱戏。

一天早晨，牛秉坤同叶春善在吉林城北山散步。一个在小树林练剑的少年一下子吸引住了牛秉坤的目光：但见他体态轻盈，动作敏捷，那剑被他舞得寒光闪闪，风声嗖嗖，仿佛把自己围在水泼不进的弧光圈里，牛秉坤简直看呆了。他酷爱京剧，也观赏过不少武术高手的表演，但这样的剑技还是不多见的，况且还是个孩子——叶春善介绍说，这孩子正是喜连成的学员，姓梅，艺名“喜群”。牛秉坤并不满意这个艺名，从此记挂着要给梅喜群起艺名的事。

一天，他专程来到腹有诗书的自家兄弟牛二爷家，请牛二爷给梅喜群



梅兰芳（右二）在英国演出时与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特（左一）等人合影

起个艺名。牛二爷沉思了片刻，说：松、竹、梅、兰四君子中，“梅”最为高雅，只有“兰”才能配得上。如取“梅兰芳香”之意，可叫“梅兰芳”。牛秉坤一听，高兴地连声称好。梅喜群听了后，也非常喜欢。从此改名为“梅兰芳”。

梅兰芳随“喜连成”戏班在吉林整整唱了两年戏。1915年春，牛秉坤带领“喜连成”戏班回北京。一路上在长春及奉天（沈阳）接连唱了几个月。“喜连成”戏班所到之地，众人奔走相告，都以一睹梅兰芳为快。梅兰芳经过四平街时，东边道尹兼四洮铁路督办马龙潭下令全城悬灯结彩，并且亲自到车站迎接。“喜连成”戏班到沈阳演出《天女散花》时，奉天军务督办赵尔巽携眷看戏，并在演出后在衙署设宴招待梅兰芳。在天津演出时，又一炮打红，轰动全城。

梅兰芳名声大振东北又誉满津门，回到北京后戏单接踵而来，梨园界在广德楼演出，为梅兰芳挂了“头牌”，从而越演越红。

梅兰芳海外演出的 幕后推手

1913年，牛秉坤结识了日本文化人、京剧迷、《顺天时报》主编适武雄，并经常给他操京胡，给他说戏。该报设有“演艺专栏”，在当时戏剧界有较大的影响。1927年《顺天时报》举

办中国首届旦角名伶评选，梅兰芳因功底深厚、嗓音圆润、扮相秀美，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一同被举为“京剧四大名旦”。

牛秉坤又把目光聚焦到海外。

他首先建议适武雄推荐梅兰芳出访日本。适武雄非常赞同他的远见卓识，积极为此事努力。1919年，日本帝国剧院董事长大昌喜八郎男爵来中国旅行，住在六国饭店。

大昌喜八郎是大昌财团的创始人，在日本财界有很大的影响力。牛秉坤便通过适武雄积极斡旋，请大昌看梅兰芳的戏。大昌看了梅兰芳主演的《天女散花》后，大为惊奇和赞赏。1919年四五月间，梅兰芳正式接受大昌喜八郎的邀请，一行三十五人，第一次赴日本演出。

梅兰芳在东京、大阪和神户共演出十七天，献演了十九个剧目，在日本各界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在全岛刮起了“梅兰芳旋风”。

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东京大地震，东京帝国剧院被震毁。1924年9月，剧院修复。大昌喜八郎为了让剧院重新开业的开幕式更为隆重，也庆祝自己88岁的寿辰，特邀请梅兰芳赴日演出。梅兰芳此次在帝国剧院共演出15场。其中《麻姑献寿》、《廉锦枫》、《红线盗盒》、《贵妃醉酒》、《嫦娥奔月》等戏，是梅兰芳专为大昌喜八郎88岁大寿演出的。

梅兰芳两次日本演出的巨大成功，都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刘竹君的注意。他建议外交部可以利用梅兰芳的精湛技艺，为中国的外交做些工作。在他的推荐下，梅兰芳应北京政府外交部邀请，首先在外交部宴会厅为招待美国人在华北创办的几所学校的俱乐部委员会演出了一场京剧《嫦娥奔月》。梅兰芳以其细腻动人的表演，赢得了300多名美国教职员的赞赏，反响十分热烈。这种演出结果是外交部没有想到的，于是从那以后，梅兰芳的演出便成为招待外宾不可缺少的节目，以至于观看梅兰芳的京剧表演，也成为来华游历的外国人心向往之的重要事情之一。

在那次观看梅兰芳为招待美国人演出的京剧《嫦娥奔月》的观众中，有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

看完演出后，他当即就对陪同他的交通总长叶恭綽表示：“若欲中美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

演出后，芮恩施还亲自到梅兰芳家去拜访，表达了邀请他去美国演出的想法。

梅兰芳虽然曾经两次成功地访问了日本，但是他认为，日本和中国同属东亚，具有文化上的亲缘性，对于中国京剧的接受相对容易；而美国与中国的文化背景相去甚远，京剧艺术能否在这个异质文化的国土上引起反响，对他本人而言完全是一个未知之数。当时美国正被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困扰，经济恶化，市场低迷，一片萧条，人们会掏腰包去看来自异域的演出吗？如果演出不理想，那么不仅仅是剧团受损失，更是对中国京剧艺术和中华民族感情的一种伤害。

梅兰芳以一种对于京剧艺术的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来思考此次出行的意义，让芮恩施深受感动。他说：“请您

放心，据我的分析判断，中国京剧一定会博得美国人的欢迎，并且可在世界上占一席地位的。”

1929年冬，梅兰芳率团从上海踏上了英国的“加拿大皇后”号邮轮，远涉重洋，到美国巡回演出。

让梅兰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美国纽约百老汇的第一场演出，就极其成功。许多美国人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所倾倒，由此对东方艺术文化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后来，黑市票价被炒至十六美元，翻了一倍还多。

梅兰芳在纽约、芝加哥、华盛顿等几十个城市共演出了72场戏，历时半年之久。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在美国掀起了一阵“梅兰芳热”的狂潮。

梅兰芳访美又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后来他又应邀去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苏联等国演出。

梅兰芳作为中国京剧界的骄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京剧艺术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也成为享誉中外的京剧艺术大师。

君子情厚谢故人

梅兰芳功成名就后，念念不忘牛秉坤的知遇之恩，不止一次十分感慨地

说：“没有牛秉坤，就没有喜连成科班，自然也就不会有我梅兰芳了。”

世事沧桑。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牛秉坤破产了。不愿在日寇铁蹄下生活的牛秉坤，带领家人来到北平，暂住在他的连襟叶春善家。

梅兰芳得知后，表示决不能袖手旁观。在他的倡导下，北平伶界决定在北平广德楼戏院为牛秉坤举办三日义演。义演由梅兰芳领衔主演，参演的还有“喜连成”戏班的艺伶侯喜奎、贾大元、萧长华、李春林、姚佩兰、高百岁、陆喜才和小十三旦等人。

义演结束后，梅兰芳用这笔钱为牛秉坤在北平置办了“阴阳二宅”。即在北平宣武门外西河沿为牛秉坤购买了一所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供其养老。又用1500块现洋，买到了院系军阀段祺瑞的一具楠木棺材。牛秉坤1943年病歿北平，死后果真用这款棺木收殓，运回吉林北山安葬。

1952年3月，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梅兰芳来东北义演，重返吉林故地。在火车上，梅兰芳就向吉林省文化局长陈海楼询问牛家后代人的情况及牛秉坤墓地的情况。得知牛家的后人都健康平安，牛秉坤的墓地也保存完好很欣慰。到了吉林市，梅兰芳在繁忙的演出准备

期间，还抽空接见了牛秉坤的部分子孙，并给了一些资金。

梅兰芳在“吉林省实验京剧院”（原清末斯美茶园、伪满新庆大戏院）共演出六天六场戏20多个剧目，群众三更排队购戏票，再次轰动吉林城。街谈巷议持续了许久，群众纷纷感谢牛秉坤给大家带来的福分。

演出刚刚结束，梅兰芳就乘坐一辆大马车，由原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宋振庭陪同，牛秉坤长孙牛世勋带路，来到吉林城北沙河子乡晓光村牛家山祖茔，凭吊牛秉坤。梅兰芳站在墓前恭恭敬敬三鞠躬，表达他对牛秉坤的感恩和思念之情。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梅兰芳在写《舞台生活四十年》之前，曾专门去征求牛秉坤夫人七姨太的意见。梅兰芳说：“我要写《舞台生活四十年》，对老东家的功绩怎么谈哪？”七姨太说：“算了，他是个资本家，如果写他，对你们都不好，会犯错误的。”梅兰芳说：“老东家的恩情，我这辈子、下辈子都报不完。做人要有良心，我宁可犯错误，也要为老东家好好写一写。”

于是，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用诚恳的语言，高度肯定了牛秉坤的功劳。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上接第37页）

方近代科学知识的机会，而且终于也有了出国求学的机缘。无怪乎梁启超由衷地感叹：“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无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愤愤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

她们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在美国学习的都是医学，学成归国后，都是集医生、教育家、社会慈善家和宗教活动家于一身的职业女性。她们或者婚姻失败或者终身未婚，身后没有子嗣，但她们

所从事的工作恰恰与拯救和延续生命直接相关，她们亲手迎接了无数新生命的降临，也使无数遭受病痛折磨的人重获新生。

金雅妹、许金匄、康爱德和石美玉，原是四位如花般娇弱的女子，生于政权交替战争频繁的乱世，独自异国求学，独自回国创业，独自扛起办医院兴女学的重任，其间必定经历了无数我们难以想象的困难。她们的坚强和勇敢源于什么？答案也许是，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信仰的力量支撑着她们渡过难关，执著前行。有信仰的人是勇敢而强大的，也是无比幸福的。

她们是中国第一批女“海归”，她们的卓越成就使得男权社会对女子刮目相看，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兴女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样板。社会观念逐渐更新，出洋的女学生日渐增多，1902年后女子出国留学成了一件颇为时髦而光彩的事，开明的官僚、商人买办和著名学者纷纷通过各种门路将女儿送往国外留学。1907年中国有了第一批官派女留学生。

在她们身后，有更多的中国女子迈出闺阁，走向世界，追求自由、独立和新知。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